

新中国学案丛书

李振宏 主编

XINZHONGGUOXUEANCONGSU

王先明 著

走向社会的历史学

——社会史理论问题研究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新中国学案丛书

王明著 王明

走向社会的历史学
——社会史理论问题研究
ZOUXIANGSHEHUIDELISHIXUE

王明 著

走向社会的历史学

——社会史理论问题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向社会的历史学——社会史理论问题研究/王先明
著.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9. 12

(新中国学案丛书/李振宏主编)

ISBN 978-7-81091-995-1

I. 走… II. 王… III. 社会史学—研究—中国 IV.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0823 号

责任编辑 李景奇

责任校对 木 子

封面设计 樊 响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 475001

电话: 0378-28250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66 千字 定 价 3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总 序

两年前,河南大学出版社约我组织一套“新中国学案”丛书,以反映新中国建立六十年来学术发展。多少年来,我一直有一个观念,认为这段历史,是最值得研究的一段历史,它最可能为人们提供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启迪;而与之相符的是,新中国的学术史,也是一段最有价值的学术史,它可以为学术的发展提供最深刻的借鉴或教益。于是,我欣然受命。

但是,这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学案这种史书体裁,历史上有其成功的范例,但却未必适合于表述当代的中国学术。学案体的开创者黄宗羲,阐述他著述《明儒学案》的用意或宗旨说: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是编分别宗旨,如灯取影……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元,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①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凡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黄宗羲创设的学案体,旨意在于梳理学派的学术渊源和论学要旨。他认为,每个学术派别,都有其论学的宗旨;不同的学派就是因其不同的学术宗旨而相区分的。学术史之要领,在于以其不同的论学要旨,将学者分为不同的学术派别而溯其源流,以明天下学术之大势。因此,他的《明儒学案》所列 19 个学案,于每个学案都首先撰一小序,述论该学派的学术宗旨及学术源流,其次再来分述学派中每个主要学者的人生经历、著作思想及其传授系统。这样,以不同的学案并立于一本书之中,而呈列一时代天下学术之全貌。这的确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传统学术史著述体裁。

当代中国学术不同于黄宗羲时代学术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学派之难以成立。新中国建立以来,政治与国家意识形态对学术有着强大的统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独尊地位及其指导作用,使我们的学术思想高度统一,无论哲学、史学乃至一切社会科学,都不可能有所谓独立学派的产生。我们只有一个学派,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于是,要写新中国的学术史,黄宗羲所创设的学案体是不适用的。我们要做的学案,必须有新的创设。譬如就史学的发展来说,可以考察的学术案例,不能以学派划分,而因问题成立。我们不能按“家”写学术史,但可以按问题写学术史。我们没有史学研究的各家各派,但有不同的学术研究领域纵横交错、异彩纷呈,就学术领域设立学案的方式则是可以成立的。于是,我们写新中国的学术史,就以问题设立学案,一个一个去梳理,是谓“新中国学案”之成立。

但是,既然名为“学案”,也还是和传统的学案体在基本精神上有相承袭之处的,那就是传统学案体所具有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精神,这一点是任何学术史著作所不可或缺的。总的来说,本丛书的基本性质,应该是一种专题学术史,或曰问题学术史。名曰“学案”,它和传统学案体著作在体裁和治学旨趣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统学案体史书在于研究不同学派的学术源流、内容及对之进行学术评断;本丛书则以问题为中心,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梳理,并对以往的学术状况给予分析和评论,使读者在一本学案著作中,既能看到某一学

术论题的学术是非的来龙去脉、发展线索、内在逻辑,又能看到作者对这些学术争论的现代评论,获得学术思想的启迪。

为了实现以上编纂思想,我们在“编写说明”中对丛书在写作上提出了如下一些基本要求:

所有大的研究专题,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内容选择上不能面面俱到,要有所选择。内容的选择,要考虑几个方面:该领域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讨论中争鸣较多的问题;对今天仍有价值和意义的问题。

要介绍或评论的内容收集,注意几个原则:最早提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最有深度的观点。

对讨论的双方或多方的学术观点,要尽可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不以个人的学术立场影响反映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讨论比较集中的问题,要围绕焦点问题展开,理清发展线索,追溯分歧的根源。

对问题的追溯和评论,要结合学术争鸣的社会历史背景来展开,把学术史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中进行梳理和评述,挖掘其社会历史根源。

要重视挖掘该问题讨论的现代学术价值。特别是类似于传统的“五朵金花”……要注意挖掘其现代价值,注意这些问题在90年代以后的意义转向。

综述与评述兼顾而侧重于评述,要写成以综述为基础的评论性著作。

这些文字,既是我们对丛书作者的基本要求,也反映了我们对学案体学术史的基本理解。新的学案体学术史应该如何写,学术界有过一些零星的看法,但缺乏深入讨论,我们也就以上想法提请学界批评讨论。

尽管我们对丛书的写作提出了一些统一性的要求,但具体到每一本书,则都是作者的个人著作。每个作者在具体写作中,在具体的学术

观点上,甚至在对学案体学术史的写法上,都有自己的理解,都享有充分的写作自由,他们都可以根据自己面对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对自己著作的立意和结构,进行创造性的或者说是完全个性化的构思和安排。因此,读者看到的这些作品,尽管都名之为“学案”,但在著述风格上则因人而异,甚至有很大的不同。有的侧重学案反映学术状况的客观性,而有的则完全将研究的对象编织到自己的思想结构中。他们写出的是不同样式的学术史。在这里,读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学术史的写法,也像人们的思想世界一样精彩纷呈。

还要说明的是,名为“新中国学案”,实际上我们出版的只是它的“史学卷”,是建国以来史学研究领域里重大问题的学术史。而且,就史学领域来说,我们选取的问题,也可能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这一方面与我们对这段学术史的理解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们所能组成的作者队伍有关。由于我们的局限,可能还有一些更需要反映的问题没有纳入进来,这些是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有所补正的。如有可能,这套丛书还可以继续做下去,以使我们的新中国学术得到尽可能全面深入的描述和反映。

今年是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改革开放也刚刚走过而立之年,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也走到了一个需要通过反思与总结而开辟新时代的关头,因此,最近几年的学术史研究逐渐升温并渐趋佳境,但愿这套丛书能够成为当下学术史热的一道新的风景。

李振宏

2009年8月2日

目 录

总 序	李振宏 (1)
前 言	(1)
第一章 史学危机与“社会史”的兴起	(3)
第一节 史学危机与社会史的萌动	(4)
第二节 何谓社会史? ——“热议”的焦点	(8)
一、社会史学科刍议	(8)
二、社会史理论研究的深化	(12)
第三节 反叛中的崛起: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启示	(17)
第四节 社会史:“新意”之所在	(23)
第二章 “复兴”的社会史:历史承继与时代创新	(28)
第一节 “新史学”的呼唤与“社会史”的理念	(29)
第二节 “社会史”论战的理论聚焦	(36)
一、社会史论战的背景及概况	(37)
二、论战时期的社会史内容的演进	(43)
三、论战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成果	(53)
第三节 新时期社会史的新关注	(59)
一、复兴与初步整合:1986 ~ 1994 年	(60)
二、突破与深化:多元走向的社会史	(63)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研究	(68)
第一节 理论影响:对话时代	(68)

第二节 马克思:新史学的大师	(72)
第三节 理论魅力: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76)
第四节 对话与争论	(81)
第五节 从“市民社会史”谈起	(85)
第四章 唯物史观与社会史研究	(89)
第一节 “树木”与“森林”	(90)
第二节 理论的困惑:转向历史	(92)
第三节 双向互动中的提升	(97)
第五章 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10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01)
第二节 学科边际:相关学科关系的讨论	(107)
第三节 学科研究对象的讨论	(114)
第四节 关于“范式”说——非学科化定位问题	(124)
第六章 社会史体系构建问题	
——基于近代社会史的思考	(135)
第一节 体系构建:两个模式	(135)
第二节 社会学化问题	(138)
第三节 双向的学科整合	(142)
第七章 社会史学:学科的历史定位	(151)
第一节 定义的困境	(151)
第二节 社会史的时代特征	(155)
第三节 历史的定位	(158)

第八章 社会史的理论范畴

——关于人、人口与社会结构	(162)
---------------------	-------

第一节 人口概念与社会结构	(162)
---------------------	-------

第二节 人类学、社会学中的社会结构	(168)
-------------------------	-------

第三节 社会结构与西方社会史研究	(171)
------------------------	-------

第四节 新范畴与中国社会史研究	(177)
-----------------------	-------

第九章 社会历史动力问题再思考

第一节 唯物史观的解析	(192)
-------------------	-------

第二节 科技推动力的解说	(195)
--------------------	-------

第三节 劳动动力论的解说	(199)
--------------------	-------

第十章 关于区域社会史

——从区域化取向谈起	(208)
------------------	-------

第一节 区域史与近代史体系的重构	(208)
------------------------	-------

第二节 关于区域史与区域化取向问题	(210)
-------------------------	-------

第三节 区域化取向与历史研究的误偏	(216)
-------------------------	-------

第十一章 跨学科走向与社会史的新拓展

第一节 历史人类学与社会史	(222)
---------------------	-------

第二节 社会生态史与环境社会史	(227)
-----------------------	-------

第三节 医疗(或医学)社会史	(237)
----------------------	-------

第四节 多元化趋向与史学本位	(241)
----------------------	-------

附录 当代国际史学的新朝向

——20 世纪下半叶的西方社会史概述	(255)
--------------------------	-------

第一节 英国新社会史	(255)
------------------	-------

一、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	(256)
二、研究理念:大众历史取向与整体史视野	(261)
第二节 法国年鉴史学	(265)
一、马克·布洛赫与心态史、精神史	(266)
二、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	(267)
三、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国际学术地位	(274)
第三节 美国社会史研究	(276)
一、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的著作	(277)
二、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的史学特色	(279)
第四节 国际史学新潮流与德国“社会史”	(282)
一、社会史潮流	(282)
二、新文化史潮流	(284)
三、全球史潮流	(285)

前 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因应着摆脱“史学危机”困境需要的中国历史学开辟了“社会史”研究领域。不久,相关的学科理论解释纷纷扬扬,既相互辩驳又互为引证,一时热烈非凡,引动了新时期历史学研究热潮的持续推进,并相当程度上重塑了中国史学的基本结构和面貌。“社会史”竟然成为新时期史学演进的主流方向,甚至被一些学者称为是对传统“革命史学”的替代——“新史学”^①。赵世瑜则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几乎相同的另一种评判,认为社会史是“新史学革命的代表”^②。但何谓“社会史”?社会史究竟与“他史”有何不同?此一学科层面上的困惑一开始就形成异常激烈的论争,并不时出现理论层面的直接交锋和不同认知的碰撞,却最终亦未获得学界的相对认同。甚至,在社会史研究对象和范畴、社会史学科是否存在等根本性问题上形成了完全相反的认识。多年来,人们对此各执一端,莫衷一是。而且,从学科层面否定社会史,认为社会史不过是“泡沫化的学科”,或者以“新社会史”来否定社会史存在价值的论说也不时出现。

透过热烈非凡的社会史专题研究的兴盛和新领域的不断开拓,我

① 如周积明、谢丹的《晚清新政时期的农村骚乱》一文中就有如下提法:“如果我们从‘革命史学’走向社会史学,却可在‘民变’中发现无比复杂的历史内涵。”见《江汉论坛》2000 年第 8 期。

②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441 页。

们看到的另一境况即是: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困境重重,学科认同疑难迭出,始终未能走出“山重水复”之境。认真体味论者的各种主张,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各自所持的论证方法不同,论证的结论相左,但有一点却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从定义出发来论证并引导出自己的结论。我称之为“定义决定论”立场。

基于定义,无论理论解说得如何完整,也无论论证得逻辑多么严密,对于所要涵盖的内容而言也都是有限的。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①在理论解释的体系内,事实上,越严密就越有限,反之亦然。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有时规律性和根本性的东西,很多情况下是无法完整的、清晰的加以表达的;或者说,任何完整清晰的表达之于规律性、内核性的东西,都是十分有限的。对于“社会史”学科而言,我们简直就是处于“道可道、非常道”的状态。因此,真正要揭示社会史的学科意义和价值,不能拘泥于定义,或者说主要不能拘泥于“定义先行”原则,而应该深入到活跃的社会史历史实践之中,追踪其出现、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通过其客观存在的历史实相,探寻出它的历史必然、时代特征和独特的学科地位。这是笔者力图摆脱社会史的定义本位,走向存在本位的基本立场,也是本书结构的基本思路。

王先明

2009年3月16日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

第一章 史学危机与“社会史”的兴起

1987年春,中国社科院历史学杂志《历史研究》集中推出一组关于社会史研究的论文和相关的学术研究综述^①,为新时期正在萌动的历史研究展现了一个新的愿景。许多学者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可以预计,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历史学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将出现繁荣局面。”^②那种发现研究“新大陆”的欢欣之情溢于言表:“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史复兴的势头不可逆转,蓓蕾初现的社会史之花,必将以自己绚丽色彩的独特风貌,盛开于万紫千红的学术园林。”^③这种期待在学者们共同努力下,经过短短几年的辛勤耕耘,不久就赢获学界的瞩目,“社会史,或者说新社会史、新史学的研究在历史学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显学’,或被视为史学界的主流”^④。然而,勃然而起的社会史研究及其理论追求的原动力,显然不是学者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史学内在追求与时代需求相互搏动的历史成果。

① 如冯尔康的《开展社会史研究》,陆震的《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对象诸问题》,宋德金的《开拓研究领域 促进史学繁荣——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述评》。见《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② 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③ 陆震:《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对象诸问题》,《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④ 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第一节 史学危机与社会史的萌动

20 世纪 80 年代,当思想领域改革开放的春天已经出现后,史学界的理论思考也进入极为活跃的时期。“历史发展动力论”和“历史创造者”的大讨论^①,成为中国史学界思想、理论转向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在对“文革史学”批判的同时,人们也对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革命运动”为主导内容的史学理念提出了强烈质疑和深刻反省。同时,面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任务的提出,面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新变动,中国历史学如何确立自己在新时期应有的地位和实现自身的学术价值等问题,就成为人们必须关注却又并非能够即刻解决的课题。只有在充满选择的时代,才能激发出富有思想意义的课题。正是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感受到了“史学危机”的存在和由此而生成的压力。

“在 1983 ~ 1988 五年间,‘史学危机’成了史学界的一个主题词,起先,是由大学生和青年学者提出,继而,整个史学界都卷入了‘是否存在史学危机,史学危机症结何在’的讨论。”^②张芝联在总结 1976 ~ 1989 年中国史学成绩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即包括“史学危机”^③。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史学对于政治生活、对于当时的市场经济已显得无用武之地,于是,注重当前社会,为现实、为社会服务的史学传统促使史学工作者以新的时代眼光去审视史学,在更大的范围内挖掘史学的功用,为史学的发展寻找出路。这一阶段进行的探讨呈现出多角度、多方位的特点,它

① 1979 年 3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历史科学规划会议,与会学者提出了“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随即,在全国学术界(已经超出历史学界而成为整个思想界的热点)出现了关于“历史动力论”讨论潮。不久,关于“历史创造者”的讨论又掀起另一轮热潮。

② 邹兆辰、江涓、邓京力:《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 页。

③ 张芝联:《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史学理论研究》1994 年第 4 期。

既表现出学者们的理性思维,也透露出学者们的急切心情。学者们从考察“史学危机”的原因入手,有人认为,是由于居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及其理论在理解和具体运用上发生了偏差,从而导致其理论体系的功能衰竭而引起史学危机;有人认为,是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史学传统价值被颠覆,从而导致历史学面临严峻考验;也有人认为,“史学危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危机”,对史学来说,不过是史学向自身的正常回归,对史学家来说,是由于史学家自身的体验对比而产生的一种失落感。上述“危机论”表明了史学家在共同关注着同一个问题,即在新的历史时期,史学家如何运用新的科学理论方法,开展有效的科学工作来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从而使史学得到健康繁荣的发展。于是,这一问题再度掀起对“历史与现实关系”和“史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的讨论高潮。虽然人们对于“史学危机”本身还难以完全取得认同,但却都不能不承认史学本身面临着不容回避的时代挑战和寻求新突破的巨大压力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面对史学危机,史学界提出种种解决的途径和方案,有人提出了“应用史学”的理论。应用史学理论显然在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现实关怀,以充分体现史学的实用价值。1949年以后的中国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曾经包裹了一层坚硬的意识形态外壳,成为历次政治运动、政治宣传的附庸和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逐步挣脱意识形态的硬壳,还原为史学本身,但也因此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史学危机。不管意识形态史学原来在方法上是多么的机械、简陋,都提供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宏大叙事。一旦这套模式解体,将如何阐释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为此而焦虑,希望重新建构一个替代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各种试图冲破陈规旧矩的创新和努力,就在“史学危机”深沉的压力下萌动了。——“社会史”不过是当时众多含苞待放花蕾中较为独特的一枝而已。

“史学危机”无疑是“新时期”史学转向的历史前提。“于是,有关‘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的自我反省和重新定位,成为对史学发展道路的探讨和预见。”“与‘史学危机’讨论同时兴起的,是‘三论’热、

历史发展合力论和‘历史创造者’的争鸣”，是“‘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倡导”。^① 当人们着意于新的史学领域的开拓和新史学理论的建构时，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深刻的反思情怀必然如影相随。田居俭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中说：

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日益僵化和片面，过分夸大阶级斗争效应，绝对固守单因果的阶级分析方法，把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从而摒弃了阶级关系之外的其他社会关系，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斥为“庸俗”、“烦琐”、“宣扬剥削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粗暴地驱逐于史学殿堂的门槛之外，轻率地中断了中国治史的优良传统。^②

因此，“史学危机”形成的深层原因之一就在于“把‘历史的内容’排出了历史，史学研究必然要出现偏颇和失误”^③。从而，“积极倡导‘复兴和加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就是“作为史学走出‘危机’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④

作为中国社会史首倡者的冯尔康也怀有强烈的解脱“史学危机”的意识。他认为“开展社会史研究是历史学走向繁荣的途径和走向新阶段的起点，这是进行社会史研究的第三个意义。现在有些历史学工作者认为史学处在危机中，不被人重视，因而思考史学的功能与出路”，而“社会史恰能充当此任”。^⑤ 可以看出，“史学危机”为人们的主动进取和谋求新突破形成了不容忽视的现实压力，并由此转变为符合时代需求的动力。“开展社会史研究的实践，会证明社会史带动史学

① 邹兆辰、江涓、邓京力：《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 页。

②③ 田居俭：《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反思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1989 年第 3 期。

④ 田居俭：《史学通向“柳暗花明”的一条途径》，《光明日报》1986 年 6 月 20 日。

⑤ 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